

长城走廊驱动边疆治理与共同体构建的机制探索

杨程耀

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DOI: 10.61369/SE.2025020038

摘 要： 本文从场域理论视角提出“长城民族走廊”范式，揭示其作为多族群互动场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的结构性作用。对于新时代发挥长城走廊对民族团结工作的作用，研究提出三条创新路径：第一，强化政府主导的动态治理机制，通过制度设计的历时性调适与资源配置的共时性整合，构建“国家在场性”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平衡框架；第二，激活文化遗产的共同体叙事功能，重构族群互动中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共识，将历史记忆转化为铸牢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第三，深化经济互补互嵌模式，推动传统资源置换向现代生产要素协同转型，构建生态—技术—文化多维互嵌的协作体系。三条路径形成“治理—文化—经济”三位一体的实践架构，既延续了长城走廊“消解边界—构建认同”的历史逻辑，又通过文化挖掘、制度创新等创新工具实现传统智慧的现代转化。

关 键 词： 长城；民族三交；民族走廊；场域

Exploring the Mechanism of Driving Frontier Governance and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the Great Wall Corridor

Yang Chengyao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10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Great Wall Ethnic Corridor" paradig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eld theory, revealing its structural role as an interactive field among multiple ethnic groups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For the new era, to leverage the role of the Great Wall corridor in ethnic unity work, three innovative approaches are proposed: First, strengthen the government-led dynamic governance mechanism, through historical adjustments in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synchronous integrat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to build a balanced framework between state presence and ethnic cultural subjectivity; Second, activate the collective narrative fun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reconstructing cultural identity and value consensus in ethnic interactions, transforming historical memory into a cultural bond that strengthens community awareness; Third, deepen the economic complementarity and interdependence model,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resource exchanges into modern production factor collaboration, building a multi-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system of ecology, technology, and culture. These three paths form a tripartite practical framework of "governance—culture—economy," which not only continues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Great Wall corridor's "boundary dissolution—identity construction" but also achieves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wisdom through cultural explo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Keywords： Great Wall; ethnic three intersections; ethnic corridor; field

前言

在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机制时，长城带作为兼具地理过渡性与文化交融性的空间场域，为理解中国历史统一性与民族互动提供了关键性研究视角。拉铁摩尔提出的“过渡地带”理论揭示了长城带在农耕与游牧文明互动中的枢纽地位——长城不仅是军事缓冲区域，更是多元经济形态、多向人口迁徙以及多重文化层积的核心场域。^[1]而在学界关于“民族走廊”的研究中，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三大走廊”^[2]（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西北走廊）理论奠定了该领域基础，并将其核心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宏观构想。关于民族走廊的研究在此之后方兴未艾，“辽西走廊”“云贵走廊”“苗疆走廊”乃至“走廊学”等新理念的相继提出极大丰富了民族走廊的学术概念，令其成为当代人类学领域的重要课题，也为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机制提供了重要线索。

作者简介：杨程耀（2003.09.11—），男，汉族，本科，研究方向：长城文化。

一、长城走廊与新时代民族工作的耦合机制

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将长城作为民族走廊看待,仍是一个相对新颖的视角。从地理上看,长城北连草原板块、东接高山森林板块、南并中原板块,西至河西走廊乃至天山南麓,在文化与地理的基础上构成了连接四大板块的“长城走廊”。长城走廊是四大板块间的隙地,是三重意义上的“边疆”,是农耕、游牧、渔猎等不同族群频繁交往、贸易互市、文明相交的核心地带。而作为走廊的长城并非单纯是一条线(border),而是一个面(zone)。在面的两边,人们不断的发生交流与碰撞,人口、文化、经济方式不断融合,使得这个面越来越丰富,长城的场域作用也愈发明显。

布迪厄认为:“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并非个体。场域才是基本性的,必须作为研究操作的焦点。”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中,场域是社会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每个族群各自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场域。每个场域之间的边界具有动态性,受惯习(habitus)变迁以及资本力量对比的消长而发生改变^[3]。长城正是一个更广义的场域,在长城带生活的不同群体中,他们各自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开始发生解体并重组,小场域的界限开始松动,开始向更大场域的边界移动;群体成员原有的惯习受到大场域中其他群体的影响也发生变化,最终向更大范围的认同开始转变。弗雷德里克·巴特也在《族群的边界》中亦提出,族群间边界并非恒定不变,亦不会阻碍社会大规模组织下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4]族群认同不是独立的,而是人们自我归属的产物,是在对内部成员的根基性情感(primordial attachment)基础上的认同。原先不同的族群在共同场域的文化接触中相互吸收文化因子(cultural factor),渐进地形成共同的价值纽带并最终有统一的认同。

历史上长城民族走廊所构建的场域效应,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明肌理。自秦汉时期“屯田戍边”政策开启的长达三百年的移民浪潮;再到清代山陕农民掀起的“走西口”移民运动,长城始终作为文化资本再生产的介质,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特质编码为新型文化符号系统。这种历时性的场域重构运动,为当代边疆治理提供了历史人类学的实践范式。基于此,为进一步在新时代发挥长城走廊在北部边疆的跨场域融合作用,本研究提出三点建议:

(一) 继续加强政府为主体的基础性作用

从夯土城墙到数字长城,从茶马古道到“一带一路”,政府始终是民族融合进程的规划师与护航者。不同于藏彝等更偏向于“通道”性质的走廊,长城走廊民族融合机制的强效不仅在于在自然地理的过渡性,更在于中央政府在制度设计、资源调配与文化整合等多领域的明显主导。不难发现,长城不仅提升了地区稳定,更成为了国家权力“在场”的明确标志。如汉武帝时期,经过河南之战与漠南之战后,对河套进行移民屯田,并设置朔方、五原郡管辖,“募民徙朔方十万口。”^[5]在河西之战后,昆邪王带领各部众归汉,驻牧于河套一带。随后汉朝又“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实之”^[6]而长城沿边的汉人也多有兼营农

牧的生产,而专门从事畜牧以致富的也不在少数。这一时期,汉人与匈奴人第一次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下共同生活,在河套一带形成了以边境城镇为中心、农耕村落与游牧民族驻牧点交错杂居的人口分布格局、农田桑林与牛羊畜产相互补充的和平共生情景。因此,长城走廊具有明显的“国家在场性”(state presence),是一种以中央政府以及其下的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干预模式,这种干预模式使得长城走廊超越自然地理的“通道”属性,成为政府主导下的族群关系调适的实验矩阵。

加强政府在新时代民族团结工作中的主导作用,需以“国家在场性”为内核,构建动态治理与价值共识的联合机制。纵观历史,从汉代的边境郡国、唐代的羁縻州府;再到明代的茶马互市、清代的西口移民,政府干预模式形成了层级递进的治理体系,即:军事系统保障边疆稳定,驿站市场促进物资流通,文教治理机构维系文化认同,最终实现“羊群与稼穡同生,胡笳与钟磬和鸣”的共生图景。现代实践需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将制度设计、资源配置、文化整合三者维度深化创新,既保留各民族特色文化空间,又重塑中华文化一体符号。例如,探索设立民族事务合规审查制度,在相关重大项目审批、文化产品创作等领域前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评估建议程序,使国家在场性从政策宣示转化为可量化的治理标准。这种治理范式的革新,本质是将长城的物理属性转化为文化认同的心理长城,使政府主导作用既体现于边境铁路、公路、网络等基础设施的“硬联通”,更彰显于各民族共享的日常文化生活的“软连接”,最终实现国家叙事与个体生命史的有机统一。这种制度设计的智慧,本质上是通过差异化赋权实现文化主体性的动态平衡,使不同族群在保持文化特质的同时,又能形成对中华文明的价值共识。

(二) 挖掘各民族历史文化的共同体叙事

2019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大学时,作出重要指示:加强对蒙古文古籍的搜集、整理、保护,挖掘弘扬蕴含其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内涵激励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7]挖掘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共同体叙事,其重要性根植于通过历史遗存,重构族群互动中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共识,进而揭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动态形成机制。例如,涂尔干(Emile Durkheim)曾深刻指出:“族群间的象征边界根植于成员们对神圣与世俗的共通界定、相似的行为规范以及对仪式与禁忌的共同遵循”。^[8]在此理论框架下,墓葬文化无疑成为透视一个族群在特定历史时期主流价值观与文化认同的标志性象征之一。墓葬形式的逐步趋同,不仅映射出不同族群间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更深刻地体现了在场域之中文化交融的复杂动态过程。东汉后,“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于是款五原塞,愿永为蕃蔽,扞御北虏。”^[9]呼韩邪单于的内附,掀起了更大的文化交融。此时长城沿线的南匈奴墓葬修造上便是有明显的汉化倾向。如陕西神木大保当南匈奴墓地多以有封土、带斜坡墓道的砖室墓,石室墓为主,体现出东汉孝道主流文化影响下的模拟墓室主人生前真实生活的墓葬习俗传统^[10]。随葬器物中除贵金属、玛瑙、玉石、骨等材质所制作的能够体现本族群文化特色的头饰、带饰以及独特的“殉牲”之外,更有大量汉式“明器”。“明器”亦称冥器,可

分为实物与拟物两大类，拟物即以雕塑形式代表人，牲畜，建筑物等，以此代替真人以及真物的陪殉，其美术风格同长城以内并无大的不同。此外更有大量具有明显汉代美学的陶器组合等的出现，而这些特点是早期匈奴墓葬及同时期远遁漠北的北匈奴的考古遗迹所没有的。这一时期墓葬文化的趋同现象，不仅仅是物质形态上的模仿或借鉴，而是更深层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念的相互渗透与融合。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表面墓葬结构的相似性、随葬品的选用与布局等方面，在更深层的结构中，反映的是对“事死如生”观念、宇宙秩序以及仪式行为的共同遵循。

挖掘各民族历史文化中的民族团结思想内涵，就要求我们注重跨族群文化元素的交融逻辑，强调主体能动性在文化选择中的作用，揭示族群互动中超越地域与血缘的文化认同机制，进而挖掘不同族群之间社会文化深层结构的相似性，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实证与学理支撑。

（三）推动农牧经济互补互嵌与协同发展

促进经济互补互嵌，根植于民族经济关系的历时性互动与共时性整合，是北部边疆民族团结的基础。从历史维度看，长城沿线的农牧交错带作为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接触界面，以茶马互市、通贡贸易等经济交往形式构建了跨民族经济网络。如明代“开中法”的实施推动了大同、张家口等边镇成为蒙汉互市的枢纽；而清代晋商通过“万里茶道”将内蒙古绥远城、陕坝、包头等节点与山西太谷、河北张家口、陕西榆林等城市为代表的北方省份串联，不仅促进了长城两边新兴商业城市的崛起，更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跨欧亚贸易体系。晋商以“旅蒙商”身份在内蒙古各地建立“大盛魁”“谦合成”等商号，将蒙古草原的皮毛、牲畜与内地的茶叶、布匹进行跨区域置换，使蒙汉民族在生产资料交换中形成利益共同蒙古与与民族交融呈现多层次、跨时空的互补互嵌特征，进而为更深层次的共同体认同奠定基础。

笔者曾于2024年8月期间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贡宝拉格苏木进行田野工作，与当地牧民进行入户访谈。在该苏木宝格丁敖包嘎查东营的八户汉族牧户家庭中，牧业生产不仅塑造了与蒙古族相似的日常习俗（如奶茶作为待客礼仪以及大量奶食品的食用），更催生了跨省域的经济协作机制。笔者访谈得知当地牧民（不分民族）会在冬季将马匹迁移至较为温暖的河北省中北部农

村，体现了生态与经济双重互惠：牧民通过菜田残余菜叶喂养马匹降低饲养成本，农民则获得有机肥料提升土壤肥力，这种资源循环模式以“借牧”为载体构建了稳定的互惠关系网络，超越了传统市场交易，通过依托“熟人人情—经济契约”双重纽带建立稳定协作关系。在辩证唯物主义视角下，牧业生计模式作为经济基础，决定了与之适配的上层建筑形态——从共有的奶茶习俗等文化符号到跨区域生产要素配置的经济行为，均印证了经济互补互嵌对民族关系形塑的基础性作用。

而若进一步深挖本地“菜叶—马匹—肥料”的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内蒙古地区可构建“草原基因库—城市实验室”的社会经济体系，利用内蒙古畜种丰富与自然养殖的区位优势，联合生物医药企业开展基因编辑技术合作，在内蒙古设立“草原生物银行”。牧民以传统畜群入股生物医药公司，企业利用基因样本开发高附加值产品，实现更深层次的合作共赢，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实践场域。

二、结语

从长城砖石的物理边界，再到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长城走廊的场域重构始终遵循“消解边界—构建纽带—凝聚共识”的演进逻辑，既见证着古代中国“多元聚为一体”的文明轨迹，又为新时代北疆发展注入新活力。长城建立在不同自然地貌与不同族群文化之间的狭长隙地，并历史性的将这些“多元”的隙地结为一体，形成一个面，提供了各民族之间交流交往交融所需的共同场域。场域之中，日月同天，草长莺飞，羊群与庄稼同生共长；瑞鹤和与鸿雁比翼齐飞，形成对立统一、差异互补、层层递进的动态耦合系统。

新时代必须要将长城历史走廊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走廊，这种转化不仅是对“长城民族走廊”历史功能的当代诠释，更延续着“胡服骑射”的变革基因。历史与现实的实践经验要求我们，在创新政府民族治理模式中凝聚价值共识；在发掘多民族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激活“五个共同”的历史记忆；在深化多地区经济互补互嵌的现代转化中夯实物质基础，方能将这条横贯古今的文明动脉转化为永续发展的精神坐标。

参考文献

- [1] 欧文·拉铁摩尔：《中国亚洲的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290-300页。
- [2] 张建勋，黄达远：《论长城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促进作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 [3] 蒙祥忠，麻国庆：《联结与交融：从民族交错地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0期。
- [4]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145页。
- [5] 弗雷德里克·巴特：《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李丽琴译，商务印书馆，2014，第1-10页。
- [6] 刘燕玲：《族群边界、族群符号与族群认同——海外华人群体边界意识探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4年第2期。
- [7] 范晔撰《后汉书》卷七十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99，第1989页。
- [8] 仪平策：《大风起兮：秦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 [9] 单月英：《匈奴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
- [10] 班固撰：《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99，第121页。第2788页。